

人力资本重构当代社会的底层逻辑

银泰证券业务部总经理 张可亮

一、对济南人力资本产业发展情况的评价

济南人力资本的发展意义重大，现代社会是货币化的社会，以资本的不断升值作为第一基本原则来运行。资本主义社会“以资为本”，已经在政治、经济、文化建立了一整套完整理论，社会主义社会“以人为本”，我国国家在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开创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要研究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命题，我想中国特色社会的深入政治经济学的推进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突破口。

社会主义社会是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社会形态，如何让生产资料在各个社会主体之间更加公平有效的分配，是我们需要解决的一件事情。资金也是生产资料，但民营企业从银行获取资金支持比较困难，限制其发展。如何解决这一问题？“人才有价”通过身价评估评测，根据自身体现的综合信用、能力，与金融、人才相结合，银行、保险、基金等为中小企业家

▶▶▶ [上接 A3 版]

《关于支持新业态新模式健康发展激活消费市场带动扩大就业的意见》学习与解读

针对“逆全球化”在将实体产业链上的某些环节拉回本国，中小企业在疫情过后，不是简单回到过去，或低水平拉锯，而是打造数字供应链，通过数据流，在更高层面整合物流、人才流、技术流、资金流等传统生产要素，以此构建具有世界先进水平数字供应链体系，在转型升级中寻找增量突破。为此，需要“打造跨越物理边界的‘虚拟产业园’和‘虚拟产业集群’，促进产业链向更高层次跃升”；“培育产业链上下游和跨行业融合的数字化生态体系”；以及“建设数字供应链，带动上下游企业加快数字化转型”。

针对“逆全球化”还停留在传统思路上，单打独斗进行孤立环节的固定资产投资，数据产业链，要强调资源共享，服务共建。例如，“通过共享经济模式开放数字化转型资源”，倡导“实现资源高效利用和价值共享”，鼓励提供“共性解决方案”、“开放普惠化的转型产品和服务”。特别是支持与鼓励平台企业推出有偿共享服务，支持互联网企业、共享经济平台建立增值应用平台，提供中台支持，以实现供应链层面的规模经济与范围经济。

新全球化面临一些全新的问题，要尝试内需驱动的全球化模式，发挥中国市场优势，把需求变成需求操作系统，为全球利益共同体服务。数据供应链，不是简单孪生实体供应链，要变成“用户指导生产”型的 C2B 模式，需要以需求为导向组织供应。新全球化真正的希望在于，吸取代理人主导全球化的教训，转型成为去官僚化、亲民化的贴心供应链，转型成为高度智能化、服务化的智慧供应链。

在这一背景下，可以更好理解《意见》提出的“实施数字供应链新业态培育行动，支持建设数字供应链”。要推动订单、产能、渠道等信息共享。支持具有产业链、供应链带动能力的核心企业打造产业“数据中台”，以信息流促进上下游、产供销协同联动，保产业链供应链稳定，发展产业服务化新生态。支持出口园区和基地创新数字服务，提供中台支持，大力发展数字贸易。

三、鼓励发展新个体经济，开辟就业新空间

提出新个体经济，是《意见》的又一大亮点。对于激发市场活力，开辟发展空间，提供了新思路。《意见》创新性地提出，支持大众基于互联网平台开展微创新，探索对创造性劳动给予合理分成，降低创业风险，激活全社会创新创业的富饶性，抓住了通过大众创新实现大繁荣的关键。

（一）新个体把握了未来经济的发展方向
《意见》引人瞩目地提出“鼓励发展新个体经济”（以下简称新个体）。新个体，可以理解为“互联网+个体”。把握了新个体经济，就把握了未来经济的发展方向。

什么是新个体？以直播带货为例。有人说，直播带货，就是把地摊经济办到了网上。不无道理。一个人练摊，是个体经济，它还是“现场直播”的，直播中的吆喝，算音频；直播中动作演示，算视频。直播带货与这种旧个体相比，新在哪里呢？旧个体练摊时，面前顶多只有一二十个观众，再多就摆不开了；新个体在网上练摊，不要说一二十万个观众、新个体万个观众也摆得下。可见，新个体是新技术条件下更加社会化的个体经济。

及其团队提供金融支持提供了理论和实践工具。这些探索，这在理论与实践两方面上，都具有重要的历史性的意义。

现在大家在探讨科技与金融的结合，其实科技都是人创造出来的，更深刻的应该是人与金融的结合，人才与金融的结合也就是人才与生产资料的结合。资本主义是将劳动者与生产资料分离，制造出无产阶级，我们要将人才和生产资料有机结合，发挥出人力资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我们的中小企业应该成为自由人的联合体，每个人都可以以身价入股，这样就可以创造出劳动者有其股的局面，社会生产力必然得到巨大提升。

再比如现行的国际会计准则，企业是以利润为中心，人力是作为企业的成本计算而非资源资产计算，这就无形中导致了企业自觉不自觉的为了做大利润，而压低人力成本的做法。如果用人力资本的视角来看的话，可能需要颠覆目前的会计准则，能不能以企业创造的综合效益来评价企业的好坏，比如企业创造的税收、支付的员工薪酬以及企业利润留存做综合考虑，这样可以兼顾国家利润、员工个人利益

▶▶▶ [上接 A3 版]

《关于支持新业态新模式健康发展激活消费市场带动扩大就业的意见》学习与解读

由此可见，新个体经济不是权宜之计，而是数字经济发展的常态，从现时起，就要鼓励发展新个体经济，通过培育新业态新模式，开辟消费和就业新空间。此前，有人焦虑担心数字经济会引发失业。纵观历史，工业革命让 90% 的农民都下岗了，但人们并没有失业，而是变成了工人。信息革命，正上演类似的事情。工人离开制造业，不等于失业，而是在新的职业中就业。中国服务业的比重，比人类平均水平，还差了二十个百分点左右，把制造业转移人口，加上新增劳动力，全部填进去，也不见得能填满。以服务化为主要就业方向的新个体经济，将提供多样化的就业机会，成为未来最广阔的工作空间，而且是生活工作一体化空间。

《意见》抓住了真问题。提出积极培育新个体，支持自主就业；提出大力发展微经济，鼓励“副业创新”。提出强化灵活就业劳动权益保障，探索多点执业。这三点，很有远见，都走到了美国的前面。美国搞数字经济，现在开始有点寒圈。他以为整整齐齐，关门搞搞技术，就可以领先数字经济，进而振兴美国经济。殊不知，10 年后他会发现又算错了账，错过了新个体经济这个机遇。美国是在《国富论》发表那一年（1776 年）成立的，他是咬着工业化的金钥匙出生的。这使美国成了世界主要国家中唯一没经历过农业经济完整过程的，美国有丰富的企业经济（在家办公）经验，没有发展个体经济（在家办公）的经验。2020 年是和世界工业化任务基本完成之年。中国必须在自身历史经验基础上，走前人没走过的创新之路。

（二）发展微经济，将降低劳动者创新创业门槛

《意见》提出大力发展微经济，鼓励“副业创新”。为劳动者降低门槛创新创业，实现跨职业的全面发展，开辟了无限的想象空间和实践空间。

《意见》提出引导“宅经济”合理发展，促进线上直播等服务新方式规范健康发展。这触及了当前实践前沿的活跃动向。以推进教育行业转型为例，线上课堂在虚拟直接接触学生，实现在家学习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疫情初起，腾讯教育就已与全国 40 多个教育部门建立联系，助力近万所学校千万师生在线上按时开学。超过 100 万名老师自助使用腾讯课堂、腾讯会议等功能快速开课，腾讯企鹅辅导为湖北学子送出 6 万节免费寒假课。

不仅在教育领域，科研部门在这次疫情中，也普遍采用了在家办公的模式。例如 2 月 6 日，疫情还较紧张时，长沙市工业与信息化局向全市各区县、园区及中小企业下发通知，鼓励远程办公、在家线上办公。

1999 年，《知本家风暴》一书率先在国内倡导“历史本家”，概念，被引入“开启中关村知识经济的‘历史先声’”。二十多年过去，如今的中关村正在被新一轮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洗礼，在全球战疫与中国经济有序复苏进程中，数字经济发挥了关键力量，而青年创业者的生存与发展关系未来。日益勃兴的共享经济为青年创新创业带来崭新机遇与无限舞台。总的来说，成为知本家的门槛正在空前降低。

知本家的发展，按照劳动与资本结合方式的不同，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在工业经济条件下发展，第二个阶段是在数字经济条件下发展。

第一个阶段，劳动与资本，通过拥有权的方式联接。

和企业集体利益。这些都是可以从“人力资本”这个视角出来，来推动理论突破。

二、对济南建设全球人力资本产业中心的建议

信用是人力资本最关键的组成要素，人力资本要有更大的发展，必须培育整个社会的信用环境和信用体系建设。可之前流行的观点是用“法治”来加强信用体系建设，但是我想“法治”只能治标不能治本，“礼治”才是信用创造的关键。

我们现在的银行体系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困境，一方面需要通过贷款来创造价值，但另一方面需要贷款条件的企业和个人却在不断减少。原因是银行的贷款方式可以简单的分为两种，一种是抵押贷款，一种是信用贷款。银行更愿意做抵押贷款，但是目前客户当中可以用来抵押的资产都抵押完了，没有上升空间。可是银行却不敢做信用贷款，因为用他们的信用评价体系来看，符合条件的不多。所以济南通过建设全球人力资本产业中心，可以进一步挖掘人才的信用，通过身价测评，赋予个人信用，既为银行提供优质客户，又解决个人和中

▶▶▶ [上接 A3 版]

《关于支持新业态新模式健康发展激活消费市场带动扩大就业的意见》学习与解读

还得是大企业主。熊彼特把知本家与资本家，分别称为企业家与资本家。认为企业家创造新价值，而资本家不创造新价值，只带来物质的“循环流转”。他们可以是一个人，也可能不是一个人（这时的知本家可能是管理者而非老板）。日本企业的知本家也差不了，例如稻盛和夫认为企业家在掌握知识上应达到圣贤级，这个门槛，对一般人来说，实在太高了。

美国为什么能超越英国呢，在费尔普斯看来，秘密在大众创新。成为知本家，门槛从精英，降低到大众。需要两个条件，一是知识产权，二是风险投资。通过这两个条件，把大众变成精英，成为创新主体。

中国互联网的兴起，是这种大众创新式的成功。在上世纪末，刚提出知本家时，知识到底值多少钱，有很大争议。知本家王志东离职时，公司搜查了他的纸篓，向资方报告说，他一个纸片也没有带走，所以知识的价值没有带走。资本家对知识的理解，显然还没有达到波兰尼所说的个人知识的程度。作为显性的知识，还是不被财务认可的。这时候，人类出现了一个伟大的制度，这就是纳斯达克的同股不同权（又叫 AB 股、双重投票权）。中美几乎所有大的互联网企业，都是这种制度的产物。同股不同权是典型的知本家制度，意思是，创始人头脑中以显性方式存在的知识（个人知识），一分钱不出，可以值（比如说 51%）的股权；而投出 100% 股份的人，只有较少的（比如 49%）的投票权（股权）。香港到 2018 年终于从落后的英国资本理念（同股同权），彻底转向美国资本理念（同股不同权），标志着知本家正式成为人类的正式的成本制度。

但是，能上市的知本家，毕竟是少数。第二个阶段，劳动与资本，通过使用权的方式联接。

还有没有比美国大众创新门槛更低的大繁荣呢？有，这就是正在中国兴起的“双创”，它属于草根创新。区别在于，大众创新要将大众转化为精英，而草根创新上大众不变成精英，就在大众状态就可以创新。学术上的区别在于，劳动掌握资本，必须拥有（期权、股份或股权），变为“使用而非拥有”（不必非成为资本家）。

关键性的改变是通用性资产的出现，使知本家在不拥有资产情况下使用资本，资本门槛大大降低。知本家获得资本，不再需要期权、股份等比较麻烦的方式去拥有，更不需要知识产权、风险投资等高风险，只要对资产“以租代买”，实际使用，然后交租金（如使用阿里虚拟店铺的服务年费）即可。这样的通用性资产包括“中台”、“通用软件”、“数字孪生的解决方案”、“数字化生产资料”等，它的特点是通过平台一次性固定资产投资，创客、小微主多次复用，好比孙悟空吹毛成风，“复印”（孪生）资本的劳动变得轻松，知本家的条件就成熟了。

草根创新，现在有多大规模？以“使用而非拥有”生产资料的计算，已占了中国企业总数的至少 40%。也就是说，已超过了当年英国、美国创新主体的规模，成为人口统计级的现象。

经济学家奇怪，我国近年固定资产投资大幅下降，从两位数，下降到一位数，又下降到低于 GDP 增速，而经济为什么还保持一定速度增长？其实，这就与 40% 以上的创业者和商业主体已适应不采用固定资产投资（而去租平台的通用性资产）的知本家经营方式直接相关。由于失去对实际的兴趣，整天唯上，经济学家像处于“丢手绢”游戏（“大家不要告诉我”）中一样，成为这场人类伟大变革的不知情者。

当前，掌握以数据为生产要素的通用性资产，成为知本家的必由之路。知本家与资本家活法最大不同，他必须与众不同，靠差异化、多样性获取剩余。资本家之所以肯将剩余的大部分让给劳动者，不是他们不喜欢钱，而是数字经济的风险太高，他们不愿再承担这样的风险，而希望成为保值的食利者。劳动者借助低资产门槛而进行创业、创新活动，也不是白得



● 张可亮（左一）与参与论坛的嘉宾合影。

小企业的贷款难题。这里要建议的是，在挖掘培育信用的过程中，一定不能单纯的利用所谓的法治手段，必须现代法治和传统礼治相结合，以“理”为主线，以法治和道德为两翼，重视诚心、正意、修身、齐家这些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修身功夫在现代社会的运用，引导个人珍惜信用、创造信用。

资本市场与人力资本产业集合密切的是股权激励，市场上已经有专业的机构做股权激励，需要综合评价有关人员的基本素质以及对公司的贡献，科学合理的对其进行激励。人力

▶▶▶ [上接 A3 版]

《关于支持新业态新模式健康发展激活消费市场带动扩大就业的意见》学习与解读

最关心的是“自媒体怎么赚钱”，“微商怎么做”。以轻资产方式创业的机会，就会造成创业多样性红利。无形中，就通过增进一次分配公平而有效率地化解中等收入陷阱。

智慧，就是为智能赋能，即为智慧赋能。其中，智慧是技术公司为利益主体提供生产力来源，使主体获得智慧这种能力。而智慧这种能力的本质，在学理上指多样化效率、范围经济效能。即相对于精英“能力”，要解决的问题（产出）复杂、多样，而付出的成本相对较少；产出（完成的任务）越多样化，平均成本越低（范围报酬递增定义）。因为固定成本（如 AI 投入）被均摊到各个任务上，小程序就完全符合这个条件。通过它，可以透视出智能经济中其它（不限于小程序）经济样式的运作方式。

通过这样的发展，数字经济将开辟出一条优化收入分配之路，为我国顺利度过中等收入陷阱做出贡献。

《意见》鼓励广泛开辟工资外收入机会，提出“鼓励对创造性劳动给予合理分成”具有深远意义，一方面，这里是指按照市场化、商业化原则，在市场竞争中使劳动者通过创新、创业，承担高风险，获得高收益（特别是较大比例剩余价值）；另一方面，广泛开辟工资外收入机会，有利于劳动者打破职业局限，发挥自身潜力和创造性，为劳动者自由而全面发展，指引了未来方向。

（三）强化灵活就业，优化分配效应

《意见》还强调强化灵活就业，探索适应跨平台、多雇主灵活就业的权益保障、共享用工”服务平台，提供线上职业培训、灵活就业供需对接等就业服务。

数据显示，2019 年前 11 个月，全国城镇新增就业 1279 万人，提前实现全年 1100 万人以上的目标，完成度高达 116.3%。从消费端的直播生态就业、到供给端的创客迭代、产业带创客，从供应链上的数字仓管师、到蚂蚁森林养员、开大病互助共济新模式的相互宝调查员……过去一年，新消费带动了大量新就业，成为数字经济创新探索的又一大亮点。

一是品牌社招热，预示着多样性灵活就业的兴起。

研究发现，品牌社招是用户最关注的招聘求职相关信息，春节后热度快速反弹至高峰；其次是招聘平台和兼职类工作。随着疫情好转，招聘行业迎来黄金期，用户求职需求，尤其是社会招聘关注度快速回升，网上求职成为重要阵地。

工作选择机会上的多样化，这是一种新机会的出现。按佩奇的说法，大众具有“多样性”（如解决方案多样性）这一优于精英的优势。支持有效需求的高收入，取决于多样性红利机会的广泛出现。兼职类工作就是典型的多样性红利机会。在智能经济条件下，这种机会一定会发展为以多样性、高收入为标志的增值应用（APP）业态的广泛出现。在苹果商店中，APP 开发者分成比例高达 85%，远远超过资产的 15%，这已成为美国当前行情。中国一旦出现这种趋势，意味着逆转两极分化的多样性红利，就会从经济中自然而然出现。

二是招商加盟热，预示着多样性轻资产运作的兴起。

研究发现，在企业服务的细分领域中，招商加盟在疫情期间搜索热度最高，三线城市的招商加盟需求最强烈。对创业者来说，风险较小、地域适应性较高的招商加盟模式成为创业首选。

智能经济出现之前，办企业的机会受重资产（固定资产）的限制，门槛很高；智能经济出现后，智能化的资产（如品牌、虚拟店铺等）可以降低（如加盟就是在分享重资产），由于实体中个人创业环境艰难，使得风险更低、退出方便的招商加盟成为了企业服务中用户关注度最高的细分领域。

相对于实体企业有 2000 多万，微商可以发展出 5000 万甚至更多。其中反映的就是机会多样性的差别。如报告中指出的，疫情使线上行业及 O2O 行业繁荣发展，自媒体、电商、商超零售成为用户最关注的招商加盟类型。人们

资本产业的发展，通过评估评测改革传统的股权激励机构，未来可在上市公司、挂牌企业优先推广，因为股权激励可以变现、转让。

三、结束语

习近平总书记在 2016 年 5 月 17 日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讲到：“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我们不能辜负了这个时代。”人力资本的研究可以重构当代人类社会的底层逻辑，续写当代的《资本论》。

▶▶▶ [上接 A3 版]

《关于支持新业态新模式健康发展激活消费市场带动扩大就业的意见》学习与解读

最关心的是“自媒体怎么赚钱”，“微商怎么做”。以轻资产方式创业的机会，就会造成创业多样性红利。无形中，就通过增进一次分配公平而有效率地化解中等收入陷阱。

智慧，就是为智能赋能，即为智慧赋能。其中，智慧是技术公司为利益主体提供生产力来源，使主体获得智慧这种能力。而智慧这种能力的本质，在学理上指多样化效率、范围经济效能。即相对于精英“能力”，要解决的问题（产出）复杂、多样，而付出的成本相对较少；产出（完成的任务）越多样化，平均成本越低（范围报酬递增定义）。因为固定成本（如 AI 投入）被均摊到各个任务上，小程序就完全符合这个条件。通过它，可以透视出智能经济中其它（不限于小程序）经济样式的运作方式。

通过这样的发展，数字经济将开辟出一条优化收入分配之路，为我国顺利度过中等收入陷阱做出贡献。

四、探索触发式监管机制，包容审慎监管

《意见》打破传统业态按区域、按行业治理的惯性思维，创新治理理念，探索触发式监管机制，建立包容审慎的新业态新模式治理规则。非常具有针对性。

举例来说，直播内容不实是一个普遍现象。前段时间，有人出于经营的目的来发布关于困境儿童和老人的相关视频和直播。7 月 1 日，由中国广告协会发布的《网络直播营销行为规范》（以下简称《规范》）将开始实施。《规范》中就明确，“主播入驻网络直播营销平台，应提供真实有效的个人身份、联系方式等信息”，这样，出了问题，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利用“有恒产者有恒心”的机理，令主播自己珍惜机会，自我约束。《规范》出台非常及时，而且由协会出面治理，也是值得提倡的。

包容审慎的新业态新模式治理，要对新业态新模式中出现的问题，分出层次，哪些应该由政府部门直接处理，哪些应该用社会力量，包括行业组织来解决，哪些可以通过市场治理来解决。有三种可选的治理方式。

一是市场治理。

如果行为的受害者市场主体，这些信息的发布者不是直接针对国家，只是为了赚钱，或只是为了博眼球，可以利用市场力量，让打击这些内容的人有盈利，从而形成打击这些现象的市场力量。比如，当初病毒软件猖獗，并不一定需要政府部门出面解决，因为他侵害的对象是个人，这就有可能通过市场的模式来解决。最后是打假公司赚了钱。

如果这些信息的发布者是“小萝卜头”，到处无孔不入，遍地都在，但是每个影响都不大，这个不应该作为治理的重点。

二是行业与社会治理。

对那些反复出现、产生的影响很严重的，应进行重点整治，其中，需要特别注意的是，一旦形成了行业产业链，有前道工序和后道工序，根据以往的经验，打断这个产业链比抓“小萝卜头”更有效。产业链又需要考虑这个背后是否有后台支撑，如果这个产业链背后有后台（如运营商）支持，那么就需要行业主管部门介入，管住上游。

三是政府治理。

如果侵害的是公共利益和国家，比如国家安全，就应该由有关部门来进行打击。政府的资源有限，应该将主要精力放在打击侵害国家、有政治目的，侵害主体是公共利益或者国家的。出现问题在治理和监管方面也要考虑行政治理成本和事件的处理方式，行政成本都要考虑。基本规律应该是抓大放小，对于影响大、恶劣的事件应该投入成本来做，对于一般性的小事件，不必小题大做。在治理中还要注意，不要伤及行业创新。